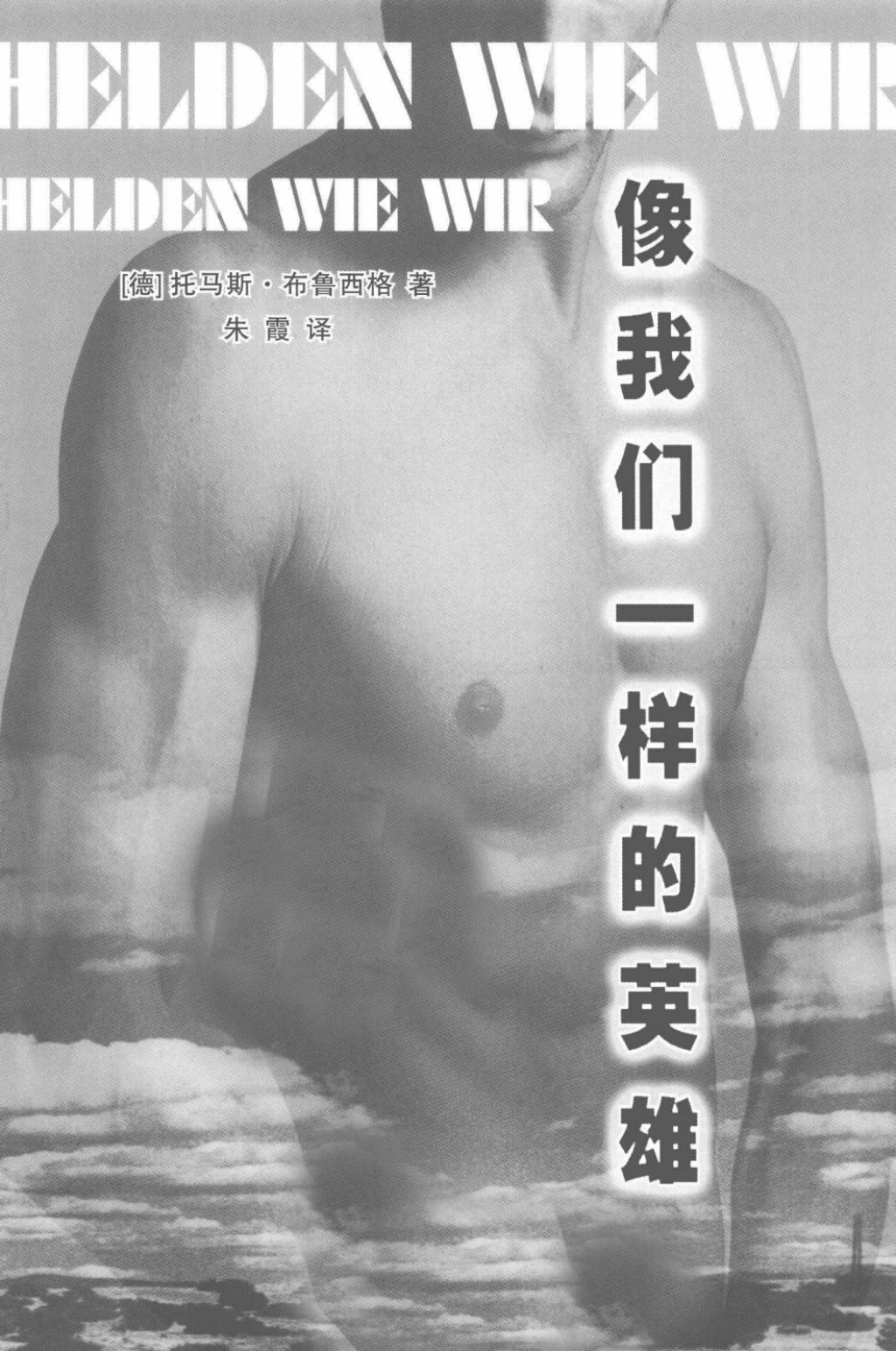


像
我
们
一
样
的
英
雄

HELDEN WIE WIR

[德] 托马斯·布鲁西格 著

朱 霞 译



像
我
们
一
样
的
英
雄

[德] 托马斯·布鲁西格 著

朱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像我们一样的英雄/(德)托马斯·布鲁西格著;朱霞
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5378-2311-1

I. 像… II. ①托… ②朱… III.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473 号

像我们一样的英雄

托马斯·布鲁西格 著

朱 霞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179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册

*

ISBN 7-5378-2311-1

I·2206 定价:12.80 元

前　　言

历史在一九八九年展现了一幅画面：在柏林，人民在柏林墙上欢乐起舞，这堵墙把这个城市分割了二十八年之久。这幅画面从此永存在世人的记忆之中。从那时到现在，这堵墙已经完全从柏林消失了，它甚至没有被作为纪念物而保存下来。但是，那个夜晚的画面却没有消失，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人们都能认出这个画面。

小说《像我们一样的英雄》便是由这幅画面而来——它讲述的是柏林墙倒塌的故事。但是它讲述的是一个编造的故事：似乎柏林墙的倒塌是某个个人所为。而这个编造的故事的讲述方式又使人对这个故事不能不信。也许果真如此。如果一个人能只身拦挡成队迎面而来的坦克，那么一个人也能只身让柏林墙倒塌。我写《像我们一样的英雄》这部小说就是想把这个道理告诉世人。小说的第一个字是“我”，这并非偶然，同样，书名《像我们一样的英雄》涉及到集体感也并非偶然。

过去的一个世纪以一场伟大的斗争为标志，人们必须在过于强大的意识形态面前为自我抗争。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把人毫无区别地加以利用，尽管人是千差万别的。谈论“我”便是居心叵测，因为谈论“我”的人，不想再把自己藏在“我们的人民”、“工人阶级”、“雅利安人种族”、“党”、“进步力量”等等的后面。

人是否真是千差万别？我出自深深的确信而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然而我明白，一个人必须为维护自己源于自然的个性而抗争。他有可能放弃个性，他的个性有可能遭到剥夺。如果

前　　言

他不把自己作为个性来感受、体验和表现，那么，人的个性便只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事实，没有什么意义。

这两个极点——趋同与个性的对峙，肯定是“中国魂”的一个重要题目。

愿我的中国读者从阅读《像我们一样的英雄》中获得乐趣。

托马斯·布鲁西格

2001. 9

译者序

一九九五年，当德国文坛大声疾呼“巨变小说何在？”的时候，托马斯·布鲁西格的小说《像我们一样的英雄》问世了，这部小说在整个德国引起极大轰动，多次再版，并被改编成广播剧、话剧和电影。作者布鲁西格也成为德国文学一代新秀的最杰出的代表。德国的《每日新闻》发表评论说：“托马斯·布鲁西格实现了德国文学评论界对出现一部杰出的描写这场巨变的小说的梦想。”这部小说很快被译成许多种语言，介绍给各国读者。

托马斯·布鲁西格一九六五年出生于东柏林。曾经当过家具搬运工、博物馆看门人和大饭店的服务员。柏林墙倒塌之后，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社会学与戏剧学。布鲁西格以既夸张又现实的手法描述了这一代人中的一个青年在民主德国的成长历程。德国《慕尼黑晚报》上的评论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味道的德国史。”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发展小说。想了解柏林墙倒塌真相的美国记者找到了克劳斯·乌尔奇特，克劳斯向他证实了是自己以一个暴露狂式的举动推倒了柏林墙，并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史，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只会在浅水区游泳的孩子变成《新柏林画报》和少先队队报《战鼓》的头版人物，又先后成为最佳读者来信的撰稿人、警觉的自淫者、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昂纳克的救命恩人、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审视者、推倒柏林墙的英雄。

克劳斯于一九六八年早产于一个小旅馆的桌子上，当时，去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坦克正从门前隆隆驶过，“污浊的空气邪

恶地颤动着”，他“降生到一个政治世界”。他有一个几乎无法读出的姓鸟尔奇特，这个姓的发音就像一种窒息时发出的声音，这从音响上恰当地描绘了克劳斯在沉闷的环境中成长的艰难。

克劳斯的母亲是东柏林一个区的卫生视察员，她对自己的儿子也像“卫生女神”一样严格审视，从洗手到被褥上的手淫痕迹。克劳斯受到诸多限制，被剥夺了健康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身体到语言，必须绝对“清洁”。洁癖使他不敢坐别人坐过的地方，不管走到哪里总是造成厕所堵塞。如厕时“有味”是一种耻辱，性被视为不洁，自然为有洁癖的母亲所不可容忍。她那绝对清洁与自我约束的教育方式使克劳斯变成一个不晓世事的傻瓜。七岁时在夏令营中，为了得到上铺，他不得不与小伙伴比赛看谁尿得远。这时他产生了满脑子的疑问，并为此感到无助和困惑。卫生上和道德上该怎么看待？这一定大错特错了。克劳斯进入了青春期，他的无知、困惑、渴望与母亲的讳莫如深使他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发笑的喜剧。他又去了夏令营，同处青春期的伙伴们的谈论使他自己的身体产生诸多疑问，于是他天真地去问母亲。从母亲那里他自然得不到满意的答案。极度的青春期反应和他总怕被人发现的心理使他在家中和在同学们面前穷于应付，狼狈不堪。

克劳斯的父亲一直令克劳斯望而生畏。父亲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不与他直接交谈。在他父亲的眼中，克劳斯是一个无能的成不了器的儿子，是一个无用的人。克劳斯感到“在他注视我的目光之下，花朵也会枯萎”。他始终受着自卑感的折磨，总想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他曾经作为少先队员上了报纸的头版，他拥有五个图书馆的借书证，他能写出最好的读者来信，他幻想着自己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而这些似乎都不是父亲所期望的。从夏令营的伙伴那里得知父亲为国家安全部工作之后，父亲在他

眼中更具有了威严与神秘的色彩。畸形的父子关系使克劳斯坐在父亲的病床前时，对临终的父亲只剩下了恨。心理上的自卑似乎也对他的身体产生了影响——他有一个无法令他自豪的很小的男性器官，这也影响到他的命运。一系列情节于是围绕着这一器官展开。在从性无知到性迷惑直至性反常的变化过程中埋藏着深深的绝望。

克劳斯在父母为他塑造的世界与现实的鸿沟之中挣扎。环境对这个青年心灵与肉体上的束缚和压抑在书中通过对克劳斯在青春期觉醒时的一连串既可悲又可笑的遭遇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人的正常的基本需要受到压制。它最终只能以扭曲与变态的方式得到满足。于是克劳斯成了一个“性反常”者。他那最小号的“尾巴”，是虚伪道德束缚之下残缺与畸形的象征。专制之下，克劳斯被剥夺了以正常的方式实现自我与满足人之生理需要的权利，他走投无路，只能“变态”。

在这种情况下，克劳斯也不可能享有正常的爱情。在他相信性与爱的统一的时候，第一个女友仅仅把他当作一次性对象，并使他染上性病；他饥不择食地找到第二个又老又丑的女友，这时已毫无爱情与美好可言，仅仅是发泄性欲而已，她只能令他想到“香肠的种类”；第三个女友聪明而高贵，在这次真正的刻骨铭心的爱情面前，多少年遭受禁锢的后果却使他无力去爱，无从去爱，以致抱憾终生。

克劳斯后来与父亲一样加入了国家安全警察。这自然与克劳斯想成为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雄心大志相去甚远。但是他只有在这里，在一群愚蠢的同事之间才能获得一点可怜的自信和自尊。为此，就连蔑视他、从不直接与他说话的父亲居然也放下报纸对他说：“喂，你也为我们干了。”克劳斯在国家安全警察中的

经历与他的家庭生活一样，给他留下痛苦的感觉。在无所事事之中，他幻想着存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这种无聊的生活只是暂时的，自己将传奇般地被派往资本主义世界去执行艰巨的任务。而实际情况是，他所从事的活动荒唐无比：成年累月地监视那些所谓对共和国不忠的人，拆看陌生人的信件，拐骗儿童，等等。布鲁西格还向我们讲述了艾斯勒本的红旗的故事和小号手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极权主义之下小人物的悲哀。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及一个勇敢的象征，“每个人仅仅是巨人脚下的侏儒，巨人站在那里，眺望着只有他能够看得到的远方。”“每个无足轻重的凡人自然必须将他的生命奉献于这么一个基座的脚下”。当年，小号手“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射向更有价值的人的子弹”，今天，克劳斯也必须用他小人物的血液来挽救一个大人物的生命，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自己“性反常者”的特殊血液成为挽救领袖生命的特殊药物，为此他差点送了命。

当他从阴界又回到阳界的时候，正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四日。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游行中，他从地铁站的台阶上摔下来，使他的生殖器受了伤，经过手术，这个此前一直小得可怜的器官膨胀起来，他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心也随之增强了。这个一直被人视为可怜虫的人，这时终于认清了社会，认清了自我。叛逆的血液开始在身体里沸腾。被压抑已久的人性的力量终于膨胀与爆发出来，在这个力量面前，作为几十年专制与非人性象征的柏林墙倒塌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当人们面对守卫东西柏林边界的士兵不知所措时，他用这个令人震惊的器官在推倒柏林墙的一幕中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打开了东西德的大门。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有意让克劳斯把在亚历山大广场上向游行群众发表演讲的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与著名

滑冰女教练员尤塔·米勒搞混了，然后又把她们与自己的母亲联系起来，她们是一代母亲的代表。克劳斯一代所受的教育是听母亲的话，听老师的话，听青少年组织的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什么对下一代好，只要乖顺听话，自己就能成长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有用的一员。这些母亲一度是高大完美的象征，克劳斯或者是布鲁西格以一代人的名义抱怨道：“她们也想像不到我们过得有多糟糕，连我自己都想像不到。”克劳斯认为，不是克里斯塔·沃尔夫以“明文真言”预言了柏林墙的倒塌，而是美国的“录音试验总统里根”喊出了：“柏林墙必须消失！”布鲁西格在书中无情地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克里斯塔·沃尔夫当年的讲话。沃尔夫是深受众多读者喜爱的东德女作家，布鲁西格此举可谓“大逆不道”。

可以说，整部小说都充满了挑衅的意味，这尤其表现在作者所使用的语言上。克劳斯在一种绝对“清洁”、虚伪、封闭、保守的环境中长大，身体和语言都受到严格的监督。父母以专制的态度，在克劳斯与现实之间建起一堵高高的“柏林墙”。克劳斯因此在现实中被打击得焦头烂额。那个时候，“在奥林匹克母亲的包围下，你怎么可能用自己的忐忑的语言来畅所欲言呢！”现在，挣脱了束缚的克劳斯，当然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一种自由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甚至示威性地使用了与母亲的教育完全相悖的近乎粗俗的语言。

大概只有作者本人能够说得清，小说中克劳斯的故事有多少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但是，每一个读者都会得到这么一种印象：克劳斯的故事不仅仅是文学虚构，就连一些并非十分重要的细节作者都描写得入木三分。作者必定糅进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内心体验。这是心中积聚已久的愤懑的爆发，是一种受到压抑的痛苦的宣泄，读起来扣动人心。布鲁西格赋予一系列悲剧以喜剧的色

译者序

彩，语言诙谐幽默，许多描述貌似天真无邪，实则尖锐犀利，再加上恰如其分的夸张，把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刻划得淋漓尽致。发表在《明星》杂志上的评论中写道：“读这部小说真是一种享受！这么大胆，这么风趣，这么幽默，这么放肆和毫无顾忌。”读者在为一系列喜剧性的冲突捧腹大笑的同时，又不禁为人性的扭曲和时代的荒唐而嚎啕。正如德国作家克利斯朵夫·迪克曼在《时代报》上发表的评论之中所言：“这是一部令人伤感的书，但是人们在读它时却会忍俊不禁。”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认为：“这是一部愤怒的、精彩的、以大胆放肆的笔触写成的书，没有哀婉的情调，非常诙谐。”

在此，我将这部小说介绍给我们中国读者，我相信，它也会得到我们中国读者的喜爱，在我们中国读者中引起共鸣。

译者 朱霞
2000年于柏林

目 录

第一章	基策尔施泰因	1
第二章	最后一个在浅水区游泳的人	10
第三章	濒临肾衰竭的血象	36
第四章	性、毒品与摇滚乐	67
第五章	女性、大街、8: 34 出现	93
第六章	小号手啊，小号手	155
第七章	复元	179

● 第一章

基策尔施泰因

可以说，有整整一个坦克团为我助产，这个坦克团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从清泉村的一个小旅馆前隆隆驶过，开赴捷克斯洛伐克。我母亲怀着九个月的我正在这个旅馆中度假。马达轰鸣，坦克的履带在石子路上格格作响。惊慌之中我戳破羊膜，顺着产道漂流而下，降生在客厅的桌子上。这是在夜里，这是在地狱之中，坦克轰轰地滚动，我来到了世上：污浊的空气邪恶地颤动着，我降生到一个政治世界。

基策尔施泰因先生，正像您看到的，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从这里记下我生命的历史，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两年时间停留在第一个段落上没有什么进展。我构思着一部令我对自己肃然起敬的自传，它应该是欧洲历史的见证，它将使人们相信我对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我这么说想让您尽早了解到我性格中那妄自尊大的一面）。如果不是您给我打电话，请

我接受您的《纽约时报》的采访的话，还不知道我这部自传要写多久。您想知道我是怎么冲破柏林墙的。说来话长了。首先请您允许我澄清几个事实。

我本来希望对我那天夜里的行动还能保守一段时间的秘密，没有想到探究真相的美国记者会这么穷追不舍。当柏林墙不复存在的时候，人民揉揉眼睛，终于相信是自己推倒了柏林墙。我心里明白，人民冲破了柏林墙的传说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说人民冲破了柏林墙，那么现在肯定在哪儿能找到这么一个人民，可是哪儿有它的踪影呢？较为清醒的观察者们会得出结论：这个冲破柏林墙的人民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么又是谁冲破了柏林墙呢？这时人们会想到沙伯夫斯基和他的新闻发布会，传说是他宣布开放了柏林墙，这正中我的下怀，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也就不会再追踪到我，我便可以专心致志地写自传，去拿那个为我准备的诺贝尔奖了。此外，我始终非常清楚，我一旦把自己抖落出来，就能轻而易举地击破这个新闻发布会的传说。仔细听听沙伯夫斯基当时是怎么说的就够了。面对新闻记者的提问和在被问及逃亡之潮时，他担保从即时起人们可以直接从这里出境去联邦德国，显然他对整个世界从电视屏幕上观赏捷克与西德边界数公里长的车龙感到恼火。他所关心的不过是别把这个逃亡大潮搞得沸沸扬扬而已。一个小时之后，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员们中断了正在进行的对协会促进法的讨论，起立高唱德国国歌。但是到这时为止，柏林墙附近尚风平浪静。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是许多好奇的人聚众观望罢了。这时候我出现了。您在电话中说，您分析了录像资料，发现了我。我还有什么可否认的呢？

是的，没错。那确实是我。是我推倒了柏林墙。不止于此。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们在他们的评论中还将此称为：“德国分裂的结束”，“德国战后秩序的终结”，“短暂的二十世纪的终结”，“现代主义的终结”，“冷战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就像那个勇敢的小裁缝一样，一下打死七个。我将告诉

您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世人有权知道我的故事，更何况我的故事不是瞎编的。

我的故事也是我那阳具的故事，但是怎么把这个附器放到这部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卫·科波菲尔》与《一个时代的巡礼》的杂交品种中去呢？我冥思苦想了两年都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现在您追踪到了我。您知道吗，您来得正是时候。如果我不能写我的尾巴的话，那么总还可以说说我的尾巴。这不是中学生吹牛皮，而是历史真相的玛赛克，如果您不想留下什么疑问的话，那么您就必须允许我的叙述大幅度向尾巴倾斜。

我向您讲述我的故事，并不只是因为您的嗅觉灵，而主要是因为我看了您的名片。能与《纽约时报》记者推心置腹地倾谈，机会难得！而且我问自己，您将在什么地方展示我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以“现代主义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等受到通缉的人？当然是在头版上！决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太棒了：我这个结束历史的人就要上《纽约时报》的头版了，它可是世界自由良知的喉舌。（这类表述我用起来得心应手。）这将是我第二次在头版上亮相。我九岁时就上了发行量最大的周刊《新柏林画报》的头版。那是在三年级来了新校长的时候。因为参加课外小组的人数列入统计，所以他以为只有在课外小组中进行的课外活动才是有意义的。校长树立了奋斗目标，要使百分之百的学生参加课外小组。我纯粹跟着感觉走，想参加帆船小组，但是我母亲认为在船上会夹伤手，或者会有翘起来的木刺——“我了解帆船上的情况！”而木刺造成的伤害会引起败血症、截肢和死亡，这我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永远考虑到最坏的情况，互相忧心忡忡地千叮咛万嘱咐在我们已经是家常便饭。她想为我做点什么的时候总是忧心忡忡。我那威严的父亲则不关心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几乎从来不和我说话，若和我说话，则是迫不得已。“把你的衬衫掖进去！”或者“安静点儿！”或者“过来！”除此之外，他总是在晚上穿着运动裤坐在电视机前，双脚泡在一盆冷水里。

“你干什么都行，但是别去开帆船！”那就参加少年自然探索者小组，不开帆船吧。这个难缠的课外小组总是被推委给最年轻的教师，这是惯例。负责我们这个课外小组的是位叫屈费尔的物理老师，才二十七岁便已经谢顶，据他称，这是“勤于思考”的结果。我不懂什么是物理。我以为少年自然探索者就是干点喂喂乌龟之类的事。屈费尔先生不知拿我们如何是好，于是便用放映机从后向前地放映关于世界经济危机和西班牙内战的教学电影。那是一些令人难忘的画面，例如，一堆瓦砾突然开始尘土飞扬，然后又变成了一栋房子，或者一架飞机像带着磁铁一样把从下面滚上来的炸弹吸到一起……（屈费尔几年以后被撵出学校的原因之一便是倒着放映战争片，制造和平假象。）后来我看了一个有关一米多高的水泥墙的电视节目，这样的墙被用来阻隔大街上的噪音。在这个节目中两次出现“物理”这个词，于是我便请屈费尔先生讲一讲隔音是怎么回事。屈费尔先生感激地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开始埋头研究声学理论。数周之后，少年自然探索者小组发明了“声学实验积木”，我们把这个发明拿到“明天的主人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去展示。不仅如此，我们还被选派参加了区博览会，在那里又被推选到专区博览会。我居然被指定为展台讲解员！我这个三年级的学生成了声学实验专家！我父亲会怎么说呢？他从来不信任我，就连“咳，这个孩子成不了器！”这句毁灭性的话他都不愿意费劲儿把它说完，他总是才说到“咳，这个孩子……”便绝望地摆摆手。他甚至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我从来没有从他的口中听到过我的名字！尽管我的名字简直不是人的名字——我叫克劳斯（很滑稽，是不是？和耗子和房子一个韵脚），但是他完全忽略我的名字仍然使我多多少少地受到伤害。现在我要到他的办公室去，让他把我重新介绍给他的同事，他会这么说：“这是我儿子，他来告诉我，他被指定为博览会展台讲解员，有关一项科学发明，可惜，可惜我对此一窍不通……”

我父亲在外贸部工作，我从来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但是地图

可以告诉我外贸部在哪儿；我坐了二十分钟的地铁。来到传达室，看门人从好几张名单中搜寻着我父亲办公室的号码。我的名字固然令人讨厌，但是真正令人倒霉的还是我的姓：总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给别人听，绝对难念，至少不能脱口而出；我曾经为此打赌打赢了——乌尔奇特。看门人那浑浊不清拖泥带水的发音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他每次说乌尔奇特的时候，唾沫星子便溅到玻璃隔板上。“我们这儿没有叫乌尔奇特的人。”他开始便这么说，最后还得这么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哪儿也找不到这个名字。我懵懵懂懂地回到家。等我父亲下班回来我问他到底在哪儿工作，他吞吞吐吐地提到什么分局。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愣愣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可不是吗！分局！我终于为我父亲总是没有好情绪找到了有力的根据：被贬黜到分属岗位，光辉灿烂的前程与他无缘了！我父亲是一个外贸部分局的孤行者，他的内心像灯塔看守人一样寂寞，那些把他放逐到分属岗位的人的卑劣行径使他被失望所吞噬。即令我父亲是我所碰到过的最令人讨厌的臭狗屎，也决不能因为这个就把他看扁了呀！“喂，谁又没关帘子？”这个谁只能是我，但是他是指哪个帘子呢？我走出房间。他带着最后通牒的表情站在那里，庄严地指着鞋架，上面的帘子没有拉上。好吧，现在我知道了他是从分局回到家的，我对他就完全另眼看待了。我关上帘子，他站着脱下鞋，又拉开帘子，把鞋放到架子上，再拉上帘子，然后讥讽地望着我：这很简单！当我，一个九岁的孩子，这时终于告诉他少年自然探索者小组被选派参加专区博览会的时候，当我终于自豪地讲到我被指定为展台讲解员的时候，您猜他说了些什么？他用手指弹着我的衬衫的扣眼说：“到时候但愿你已经学会怎么把衣服穿好。”

不去想它了吧。据说在博览会开幕的那一天将有“重要代表”来巡视。按计划他们还将参观我的展台。校长和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帮我为这一时刻作准备，不停地谈论着荣誉和意义。不用说，我的衬衫扣得好好的。关于这一事件本身，我只记得几个肥